

武装的傀儡：汪伪政权警卫部队之管窥^{*}

叶 铭

内容提要 汪伪政权的警卫部队是汪精卫的嫡系部队。警卫部队发展脉络大体包括警卫旅、警卫师和警卫军三个阶段，其装备在伪军中尚可称得上精良。从汪伪政权警卫部队的建立、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可以看出汪伪政权力图建立起一支自己掌控的武装，作为政权存在的基础，这是其武装工具性的一面。但是，汪伪政权警卫部队建立与发展的每个过程，都受制于日本整体对华政策，特别是受到日本对汪伪政权政策的影响。因而，汪伪政权的武装只能是在日本操控之下生存，不可避免有其傀儡性的一面。近代以来，军事力量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汪伪警卫部队的建立、发展与消亡的过程，表明其即使拥有武装，也摆脱不了傀儡的特性。

关键词 抗战 侵华 伪军 汪伪警卫部队

军事史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历史学界过去对汪伪军事力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比较重要的有余子道、苏时文、刘熙明等人的论著。余子道的《汪伪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亡》分析了汪伪军事力量的性质和特点。^① 苏时文的《汪伪的军事组织和伪军》以时间为脉络，介绍了汪伪政权中枢军事机构的构成和人员、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有关军事的秘密协定，分析了汪伪政权的中央直辖武装（陆海空军以及税警总团）和各派系各地方政权伪军事力量的建立发展情况，文章侧重于资料回顾，史料性相对较强。^② 刘熙明的《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运用大陆与台湾相关部门所藏伪军的档案及回忆资料，重点阐述了伪军这种特殊武装力量产生的原因、其游移于各种势力之间获取利益的方式，以及伪军在抗战中所扮演的角色。该书史料扎实，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伪军的投机性。^③ 这些研究虽各有侧重点，但基本上都是从总体上把握汪伪政权军事力量的发展脉络以及汪伪军事力量与各方面的关系。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多关注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战专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16KZD02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余子道：《汪伪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亡》，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180页。

② 苏时文：《汪伪的军事组织和伪军》，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89年版，第39—57页。

③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5)》，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汪伪政权本身,关于伪军的研究多集中在伪满军队,总体来说对汪伪政权军队的研究几乎没有涉足。^①

汪伪“建军”的计划贯穿汪伪政权之始终,汪伪警卫部队(以下为行文方便亦简称“警卫部队”)的建立是其“建军”的尝试。汪精卫早年活动多以失败告终,自认为原因是没有自己的部队。在河内期间他向日本政府提出“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起组织反共救国同盟军,并组织12个师的军队”。^②其后亦与影佐祯昭谈及“建立政府,则必要具备兵力”。^③汪精卫在阐述其“建军”目的时指出“建军是建国的手段,建国是建军的目的。为建国而建军,有极深远的意义,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到的。我们第一要把军队造成国家的军队,把以前军阀及个人独裁的形迹,扫除得干干净净”。他声称“建军”“为的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为的是要打破个人独裁的军事制度。建立国家化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来负担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平,反共,建国”。^④军队是建立政权的支柱,故而“建军”是汪的梦想。汪精卫在脱离抗战阵营,投向日本侵略者并组织傀儡政权之后,收编了大量的杂牌军队和地方武装。他试图仿照黄埔建军模式建立起一支自己可以控制的嫡系武装,作为政权的支柱。所谓警卫部队就是汪伪政权的嫡系部队,其发展历经了警卫旅、警卫师和警卫军三个阶段。汪伪政权对警卫部队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其收编的伪军。

本文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汪伪政权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以及军事委员会档案为中心,梳理汪伪警卫部队的建立及发展历程,揭示其作为伪政权武装的工具性,以及为日本掌控与压制的傀儡性。

一、“建军”之始:警卫旅的建立与任务

日本政府认为汪精卫可以策动地方实力派如龙云、张发奎等脱离蒋介石国民政府,以他们的武装作为汪伪政权“建军”的基础,然而这种“建军”模式未能实现,汪在正式建立伪政权之前,只能四处收编游杂部队作为其政权的军事力量,1939年在上海首先成立了由王天木为总指挥的“和平建国军”。汪伪政权成立初期所能依靠的最大一股军事力量是任援道的苏浙皖绥靖军,南京周围是任援道的防地。然而任是维新政权的旧人,并不为汪精卫信任。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江湾设立了伪中央军官训练团,试图仿照黄埔建军模式建立嫡系部队,汪伪警卫旅(以下为行文方便亦简称“警卫旅”)即从伪中央军官训练团发展而来,是汪伪警卫武装的奠基和开端。

1. 伪中央军官训练团

1939年,汪精卫指派原国民政府武汉警备司令叶蓬负责建立军校,叶派部属刘培绪去北方搜罗人员。汪计划以“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名义招募4000人,并以此组成伪中央军官训练团。影

^① 日本学界关于伪政权军事的研究主要有石島紀之「対日『協力』の諸相——『協力』政権、民眾」、『現代中国研究』第35・36合併号、現代中国歴史研究会、2015年、3—14頁;劉傑「汪兆銘政権論」、倉沢愛子ほか編『岩波講座アジア太平洋戦争』第7巻、岩波書店、2006年、273—276頁。关于伪满军队的研究主要有平井広一「満洲国の軍事予算と兵器調達」、『北星論集』(経)第52巻第2号、北星学園大学経済学部、2014年、26—38頁;阿部寛「満洲帝国の防衛法について:『防衛』実施に関する規定を中心」、『軍事史学』総第53号、2018年、108—129頁;松野誠也「関東軍と満洲國軍」、『歴史学研究』総949号、2016年、34—48頁。

^② 蔡德金、王升:《汪精卫生平纪事》,中国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③ 影佐祯昭:《汪精卫在从河内到上海船上所作的重要发言》,引自黄美真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6页。

^④ 汪精卫:《建军之目的——在检阅中央陆军军训团开操典礼训词》(1940年1月5日),中央电讯社出版委员会编:《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选集》(“时局丛书”第3辑),中央电讯社出版委员会1944年版,第93页。

佐祯昭派出山崎大尉与日本华北驻军联络关系，公开招募。刘培绪招得2500余人回到上海，以江湾的旧日本兵营作为汪伪中央军官训练团的校址。^① 这批学员入学必须办理担保连坐手续，在入学前找到三个保人，签署连坐保词。^②

12月9日训练团举行开学典礼，汪精卫亲自参加并自兼训练团团长。汪为收买人心，发给每一个官佐、学员一套黄色马裤呢军装，官佐每人一双马靴、一把刻有“智深勇沉汪精卫敬赠”的佩刀。在经费相对困难的情况下，军校学员每月津贴60元，学生每月30元。^③ 开学典礼上所有人必须进行宣誓效忠。^④ 汪精卫在开学典礼训词中提出“日本是战胜国，他能认识错处，改正错处，他要在不损害中国独立自由的基本原则之下，与中国建立和平，使中国能够分担东亚和平与秩序之责任。日本是战胜国，能够如此，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应该以十二分的勇气来认识错处，改正错处”，期望训练团“担负完成和平反共建国的使命”。^⑤ “这些人毕业后除少数分配在伪军中任职外，大多数则只充当了汪精卫的亲卫队，或在一些军事机关内充当内勤。学生队由于不到毕业年限，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则由叶蓬带往武汉，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继续受训”。^⑥

汪精卫成立伪中央军官训练团最初目的是利用军校培训“建军”需要的下级军官，最终伪训练团总队长以及学生队的队长都成了警卫旅的主要军官。

表1 伪中央军官训练团主要成员表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汪精卫	团长	张诚	总队长
叶蓬	教育长	阮伟文	学员队第一大队长
刘培绪	副教育长	吴清明	学员队第二大队长
魏练青	办公厅主任	于慕周(后为李友竹)	学生队第一大队长
郭尔珍	教务处处长	刘英儒(后为关靖波)	学生队第二大队长
罗君强	政训处长	郭汗长(后为韩蕴山)	学生队第三大队长
黄曦	总务处长	萧叔宣	高级教官
沈伯衡	总务副处长	孙希文	高级教官

资料来源：《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学员详历表》（1940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782。

① 胡幼植、傅大兴：《汪伪政权“建军”拾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180页。

② 《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学员详历表》（1940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782。

③ 学员自军官中选拔，学生则由平民考试选取。

④ “余誓以至诚服膺三民主义，接受领袖之指导，奉行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恪守纪律，尽忠职守，永矢弗谖，如有逾越，甘受严谴，谨誓”。《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教职员及学员誓词》（1939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137。

⑤ 汪精卫：《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训词》（1939年），学艺研究社：《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报出版社1940年版，第121—122页。

⑥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页。

2. 警卫旅的成立和编制

1940年2月,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接见张诚,详商编练警卫旅问题”。^①3月,警卫旅成立,这是汪伪政权的第一支嫡系正规军,主要任务是负责汪伪政权各机关的警卫工作及汪伪首都南京的部分警备工作。警卫旅番号存在了约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中警卫旅有两任旅长,第一任旅长是张诚,字居敬,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少将高级参谋^②,1939年出任伪中央军官训练团总队长,1940年任汪伪警卫旅旅长,同年病死。汪伪警卫旅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旅长刘夷,黄埔第2期生,刘峙之侄,1941年他兼任汪伪“中央陆军军士教导团”中将团长^③,后因为与刘培绪闹矛盾,被撤销职务。

警卫旅是一支特殊的军队,它不仅是汪伪正规陆军部队,具有普通军队的特征,同时也是一支具有警备卫护性质的警卫部队。其编制除了按照陆军部队编有作战部队外,还有担任警备卫护任务的警卫大队及宪兵大队。

警卫旅指挥机关是旅部,编制有旅长、参谋长、军医处长、军械处长、军需处长、副官若干、士兵86人。^④此外旅部还编有特务连1个及训练干部的学兵团1个。^⑤

警卫旅成立时由于员额不足,只有第一团一个团的编制。^⑥第一团团部有军官士兵共计51人。下辖3个营,各营营部编制相同,均为官兵20人。各营均辖步兵连3个及机枪连1个,各连连部编制有官兵21人。每连辖3个排,每排辖3个班,第一团官兵共计1645人。^⑦之后由警卫旅第一团第二营的营长魏天秩接收在安徽等地招募到的新兵,于1940年7月9日正式成立了第二团,团长由魏天秩担任。由于第二团系匆忙招募,所以人员少于编制人数,总共编成7个步兵连,没有机枪连编制,官兵共计785人。

按照汪伪政权陆军编制,汪伪的步兵旅应下辖两个步兵团,然而,警卫旅毕竟是汪伪政权重点扶植的军队,所以在编制上享受特殊待遇。1940年12月底伪军事委员会调驻扎山东南部的于惠民部南下^⑧,1941年1月1日该部正式编为警卫旅补充团,官兵总计为864人。

警卫旅两个团作战部队约有2000余人^⑨,其余为担负警备卫护任务的警卫大队和宪兵大队,装备均强于汪伪政权其他军队。

警卫大队的由来据罗君强回忆“叶蓬从上海卢英手下的伪警中,抽调数百名曾服过兵役、体格较好的警察,编成一个警卫大队,以洪某^⑩为大队长,满其蔚为大队附,在军官训练团受训。按原计划本

①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0年2月18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②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第248页,注1。

③ 曹玄庆:《汪精卫“建军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第181页。

④ 《警卫旅步兵司令部及第二团官佐兵夫役入伍花名清册》(1940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845。

⑤ 《汪伪警卫旅有关给旅长刘夷指令》(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2195。

⑥ 《警卫旅旅长张诚呈送所属各团队12月份官兵薪饷名册》(1941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491。其中张诚呈称“兹拟定于六月一日分发薪饷,理合检同职旅旅部暨第一团,警卫大队,宪兵大队薪饷名册各一份”,可知警卫大队与宪兵大队当时在警卫旅编制之中。

⑦ 《警卫旅步兵一团兵夫入伍花名清册》(1940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844。

⑧ 《汪伪警卫师司令部及其一、二、三团、特务团军官详细履历表》(1941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39。

⑨ 《警卫旅旅长张诚呈送所属各团队12月份官兵薪饷名册》(1941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491。根据该文件“实到二千四百七十九员名”可知,1941年1月4日警卫旅各团领饷人员共计2479人。这其中不包括第三团、警卫大队和宪兵大队的人员。

⑩ 即洪振,参见《警卫旅警卫大队部暨各分队和特务班及直属通信兵官佐兵夫花名清册》(1940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843。

来是准备替汪精卫当卫士的，后因汪与叶蓬感情不佳，恐怕这批人政治上靠不住，仅把他们编为国民政府警卫大队，在南京机关里站岗放哨，或替要人们守大门，不久又把这个大队并入以张诚为警卫旅长的部队内”。^① 警卫大队大队部编制有军官 19 人，下辖 6 个分队、1 个特务班及 1 个直属通信队。分队又下辖若干班，班为警卫大队基层建制单位，特务班编制有官兵 13 人，官兵总计 406 人。^②

宪兵大队的由来大致如此：“由日寇从北平宪兵司令部邵文凯处拨来一营人，还成立了一个宪兵司令部，以张诚为指挥。”^③ 这支宪兵大队约 300 人，其编制为大队下辖 3 个中队，中队下辖 3 个分队。大队部编制有军官 8 人，士兵 29 人，中队编制有军官 10 人，士兵 110 人。到 1940 年年底，汪伪成立了宪兵指挥部，由警卫旅旅长刘夷兼任指挥，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为李鸿志，第二大队队长为田紫桢，驻南京市郊。^④

3. 警卫旅的兵员招募

警卫旅由于员额不足（根据张诚报告缺额 4000 余名），所以必须招募新兵作为补充。1940 年 5 月，旅长张诚派第一团团长李友竹为招募主任去蚌埠一带征兵。其《征募新兵办法大纲》规定，只能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的所谓“非匪”区域招兵，在济南、开封、蚌埠、徐州四个城市设立征募新兵处，并可酌情设立分部。招兵以征兵为主，募兵次之，以节省经费。新兵要求“身家清白，体格健全，毫无嗜好，年在十八以上三十以下”，身高最低为 1.4 米。

所有新兵由各地乡保长盖印并填具保结联单送至各新兵征募处检验，并由日本特务机关颁发通行证，每 100 人为一组派军官 3 人率领送到设于徐州及南京的新兵训练处。新兵训练处负责点收编队募集的新兵，按两个团进行分队，然后加以训练，训练完毕编入警卫旅各团。由于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警卫旅招募新兵计划频频受挫。1940 年底征募到的 380 余名新兵，1941 年 3 月 13 日即在蚌埠被新四军解放。^⑤

4. 警卫旅的基本任务

警卫旅由于实力不足，没有承担野战任务。汪伪政权在成立之初，主要依靠任援道的军队。伪南京市当时只有任援道部的伪警备总队（任之子任祖萱指挥）和伪地区独立团（指挥官陈炎生）^⑥，汪伪军事参议院的守卫甚至只能“由绥靖军部队派遣”。^⑦ 汪伪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厅长臧卓提出“对于宪兵队及警卫旅，应加以扩充、充实，以拱卫首都”。^⑧ 用警卫旅担任南京城内汪伪政权各机关的警卫任务^⑨，其中警卫大队的第四分队及特务班负责汪伪财政部警卫任务。^⑩ 1940 年 10 月 10

^①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 页。

^② 《警卫旅警卫大队部暨各分队和特务班及直属通信兵官佐兵夫花名清册》（1940 年 8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843。

^③ 徐向宸、杨蔚云、张耀宸：《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0 页。

^④ 《汪伪军委会所属部队编成位置表》（1940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152。

^⑤ 《警卫旅旅长张诚拟具征募新兵办法呈文》（1940 年 5 月—1941 年 5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602。

^⑥ 《汪伪军委会所属部队编成位置表》（1940 年 12 月 28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152。

^⑦ 《汪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组织法》（1940 年）附记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2。

^⑧ 臧卓著，蔡登山编：《我在蒋介石与汪精卫身边的日子》，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3 页。

^⑨ 《警卫旅步兵司令部及第二团官佐兵夫役入伍花名清册》（1940 年 8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845。

^⑩ 《警卫旅警卫大队部暨各分队和特务班及直属通信兵官佐兵夫花名清册》（1940 年 8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843。

日,日本方面同意“将南京城门检查权等交给汪伪军警执行”^①,宪兵队“担任南京各伪院部衙门和伪官住宅的警卫,并负有监视责任……配合日本宪兵、特务守卫城门、车站、码头”。^②

二、以“强化”求发展:警卫旅扩充为警卫师

汪伪警卫师(以下为行文方便亦简称“警卫师”)是在日方有意“强化”汪伪政权的前提下由警卫旅扩编而来的。根据相关人士回忆,1940 年日伪双方进行了《日华军事协定》的谈判,最终由汪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杨揆一与日本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签订协定,主要规定日本方面供应汪伪政权武器弹药,并可以指挥控制汪伪政权的军事力量。其后订立《军械借款条约》,作为伪政权“建军”的规划。1941 年,日军交给汪伪政权部分武器以及部分中条山战役的国军战俘以成立警卫师。^③ 1941 年 3 月汪伪政权“第一次全国军事会议”在南京召开,确定所谓“扩展规模,充实力量,以期外则能与先进友邦保障东亚,内则能确立治安,捍卫人民……本一心一德之精神,收群策群力之效果,俾和平真谛,益以阐扬,防共实力,益以发展,建立国家军队之宏规,定成东亚共荣之伟业”的原则。^④ 根据这一原则,警卫旅扩编为警卫师。^⑤

1. 警卫师的基本概况

警卫师军官中出身于军校的占 50%,其中的 47% 毕业于伪中央军官训练团(详见表 2)。警卫师各部官兵年龄集中于 16 岁到 36 岁之间,官兵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籍贯江苏为最多,第三团籍贯大多为山东,官兵入伍前职业分布比较均衡(详见表 3)。

表 2 警卫师各部队官佐出身统计表

出 身 属 情 单 位	陆军 大学 毕业	保定陆 军军 官学校 毕业	中央军 校毕业 (含伪 军校)	各省 讲武堂 毕业	伪中央 军官 训练团 毕业	政治学 校毕业	其他军 事院校 毕业	其他专 门学校 毕业	大学 毕业	中学 毕业	行伍 出身
师司令部	1	4	7	3	7	2	8	8	2	33	2
第一团	无	2	5	2	25	无	21	6	1	14	3
第二团	无	2	4	无	15	无	17	6	无	7	2
第三团	无	无	1	2	11	无	5	34	3	34	10
特务团	无	无	10	4	无	无	26	1	1	10	18
特务连	无	无	2	无	无	1	12	无	无	无	无
通信队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5	无	1	无

资料来源:《校阅警卫师一般成绩报告书》(1941 年 12 月),《警卫师 1941 年度临时校阅成绩报告书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530。

① 蔡德金:《汪精卫国民政府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29 辑,第 11 页。

② 苏时文:《汪伪的军事组织和伪军》,《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29 辑,第 45 页。

③ 徐向宸、杨蔚云、张耀宸:《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5 辑,第 209 页。

④ 《军事会议》(特辑),《政治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40 年 4 月,第 38 页。

⑤ 《关于警卫师改编的相关文件》(1941 年 5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756。

表3 警卫师各部官兵年龄籍贯职业概况表

单位	分布情况	师司令部	第一团	第二团	第三团	特务团	特务连	通信队
年龄	16—26岁	60%	45%	48%	22%	44%	60%	48%
	26—36岁	10%	25%	48%	55%	43%	23%	43%
	36—46岁	10%	20%	4%	23%			9%
籍贯	江苏	60%	38%	40%	38%	36%	60%	75%
	山东		12%	2%	37%	22%	8%	1%
	河北	7%		4%	9%	13%	10%	3%
	河南		16%	4%	3%		1%	4%
	其他	17%	33%	50%	13%	13%	6%	17%
职业	农业	22%	32%	36%	27%	35%	25%	8%
	商业	18%	26%	25%	5%	20%	30%	27%
	工业	8%	32%	21%	35%	26%	32%	11%
	其他	33%	20%	18%	33%	17%	12%	54%

资料来源：《校阅警卫师一般成绩报告书》（1941年12月），《警卫师1941年度临时校阅成绩报告书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530。

根据报告，汪伪警卫师特务团及特务连军风纪最优，第二团次之，第一团又次之，第三团最差。^① 特务团及特务连担任警卫任务，军风纪方面要求严格。第二团新兵多，相对不敢造次。第一团成立较早，官兵中老兵油子较多，第三团原系地方部队，因而军纪问题最多。

汪伪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对警卫师的建设，提出相应改进意见。其一，增强实力，“增编骑兵一连直隶于师司令部，以资训练”，此外购买步兵炮装备新编步兵炮连。其二，加强所属干部训练，从军事业务以及训练方面加强警卫师官兵学习。^② 其三，加强士兵军事技能训练^③，实施常规军事训练。^④

2. 警卫师的编制及装备

汪伪警卫师各团主官与警卫旅基本相同，但是师部主官变化较大。师长先后为郑大章及李讴一，副师长为陆振清及洪振，参谋长为邢聚五。师司令部编制有中将师长以下官兵272人，下辖4个团、1个特务连及1个通信队。4个团分别由原汪伪警卫旅的第一、第二、补充团及警卫大队改编，除了宪兵大队脱离建制外，其编制没有太大变化。只有警卫大队士兵人数不够，只能“将前警卫旅之警卫大队扩充为警卫师特务团，请以该大队现有官兵全数依照从前待遇先编成第一营”。

^① 《校阅警卫师一般成绩报告书》（1941年12月），《警卫师1941年度临时校阅成绩报告书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530。

^② 《军委会令警卫师对应行政改革事项办理具报案》（1941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553。

^③ 《汪伪军事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纪录》（1941年1月17日），《汪伪军事委员会会报部分纪录》（1941—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556。

^④ 《警卫师所属第三团二营调赴孝陵卫训练情形》（1942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053。

汪伪警卫师曾想将特务团扩编,但是被汪伪经理总监署总监何炳贤否决。^①

警卫师第一团改编自警卫旅第一团,团部及各部编制与警卫旅第一团相同,官兵共计861人。第二团改编自警卫旅第二团,官兵共计937人。第三团改编自警卫旅补充团,官兵共计886人。特务团改编自警卫旅警卫大队,官兵共计377人。因宪兵大队脱离,及士兵逃亡与哗变,汪伪警卫师官兵总计3446人^②,少于汪伪警卫旅的人数。

汪伪警卫师共装备轻机枪129挺,重机枪40挺^③,按照其编制4个团10个营计算,每个步兵营平均拥有4挺重机枪,每个连平均4挺轻机枪,每个士兵都有一支枪,武器配备平均,制式化程度较高。对比汪伪政权其余军队而言,这种装备相当不错,堪称精良。如伪孙良诚部第二方面军,两个军官兵总计近40000人总共只有210挺轻机枪。^④

3. 警卫师的兵员招募与补充

汪伪警卫师除警卫任务外,还担负一定的作战任务,加之警卫师内部出现的逃亡及哗变现象,必须补充兵员缺额,但补充规模较小。

根据档案,警卫师军官有部分来自于汪伪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⑤,另一个来源则是战俘,1941年汪伪警卫师从中条山战役被俘的国军军官中挑选了70名补充军官缺额。^⑥士兵的招募与补充则比较复杂,招募新兵仅能零星招募。^⑦1941年中,第二团第一营去上海招募新兵,特务团在合肥招募新兵30名,还委托伪第一军招募新兵。但这种零星招募方法并不能满足补充兵员的需要,其最大规模的兵员补充是在1941年7月,从战俘中挑选出国军官兵1040人补充了部队。^⑧1942年5月,李讴一请求“每月招募叁百余名,三个月为期,约共招募壹千名”,却被汪伪军事委员会以扩军计划安排在1943年度为由否决了。^⑨由此看来,汪伪警卫师的扩编过程很是艰难。

4. 警卫师的任务

汪伪警卫师任务比警卫旅时期要复杂繁重,包括警备及军事活动。其主要任务是“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之亲卫及重要地区之警备”^⑩,以及“警备不虞,捍卫首都”。^⑪早期更类似于一支宪兵团

① 《警卫师改编相关文件》(1941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80。

② 《军委会呈送国民政府直辖军队整备要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请备案》(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658。

③ 《军委会呈送国民政府直辖军队整备要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请备案》(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658。

④ 《鲍文樾点验孙良诚所部第二方面军报告书》(1942年7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153。

⑤ 《警卫师呈请武汉分校毕业学员每月津贴数目请核示案》(1941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333。

⑥ 《汪伪军事委员会第十三次会报纪录》(1941年7月19日)、《汪伪军事委员会会报部分纪录》(1941—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556。

⑦ 《汪伪警卫师长李讴一呈文》(1942年1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604。

⑧ 《汪伪军事委员会第十三次会报纪录》(1941年7月19日)、《汪伪军事委员会会报部分纪录》(1941—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556。

⑨ 《汪伪警卫师师长李讴一呈文》(1942年1月—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604。

⑩ 《军委会呈送国民政府直辖军队整备要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请备案》(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658。

⑪ 《军委会令警卫师对应行政改革事项办理具报案》(1941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553。

或警察部队，其后，警卫师逐渐开始担负军事任务，负责南京铁路线的维护与城郊地区的警卫。^① 同时，还需协助日军执行任务。1942年7月6日，汪伪警卫师驻索墅镇的第一营应日军顾问部要求去安徽接受军米。在执行军事任务过程中，第二、第三连被新四军袭击，战斗中失踪25人，被缴获三八式步枪12支，十一年式轻机枪1挺，子弹4000发。^②

三、以“参战”求扩编：警卫军的编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形势所迫，日本方面最终同意汪伪政权参战。借此机会，汪伪政权加快了将警卫师扩编为汪伪警卫军（以下为行文方便亦简称为“警卫军”）的步伐。军长是陈公博，但只是挂名，平时由参谋长祝晴川负责日常活动。祝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担任汪伪航空处主任、汪伪首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③ 警卫军第一师师长刘启雄，黄埔第2期毕业，原为八十七师旅长，南京保卫战后投敌。^④ 副师长熊子浩，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第4期毕业，原为国民政府江苏保安处团长，投敌后在汪伪中央军校筹备处任教官。^⑤ 第二师师长秦汉青，保定军校第5期毕业，原在二十九军，1940年投敌后在伪军事训练部及伪陆军将校训练团任职。^⑥ 第三师师长陈孝强，黄埔第2期毕业，原国军预备第八师师长，中条山战役被俘投敌。^⑦ 后任师长钟剑魂，投敌后在“和平建国军”及伪独立第十四旅任职，1945年率部起义，任国军华中独立第一军军长。^⑧

1. 伪中央军官学校

周佛海认为“建军有两种途径，第一是吸引重庆军的方法，其次便是自己成立军队。前者现正在工作中，后者已决自七月起，拟有设军官学校，养成二千军官的方针，并拟扩警卫旅为警卫师，及编成教导师。还都以后的军队，现已增至十六、七万，今后当能逐渐强化”。^⑨ 建立军官学校是汪伪政权为进一步扩大警卫部队所做的准备。

“1941年初，汪精卫为了培养军事骨干，仿效了国民党的办法，打算成立中央军官学校，并于年初成立了中央军校筹备委员会……伪中央军校由汪精卫兼校务委员会主席，陈公博、周佛海、杨揆一、任援道、鲍文樾、肖叔宣、何炳贤、刘启雄等任校务委员，何炳贤兼秘书长，刘启雄兼教育长”。^⑩ 汪伪中央军校校址位于原国民政府励志社，分别在南京、广州、汉口和北京招生，年龄18—25周岁之间，身高155厘米以上，体重45千克以上，在高中或以上学校毕业的，信仰“和平反

^① 《汪伪军事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报纪录》（1941年4月4日），《汪伪军事委员会会报部分纪录》（1941—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556。

^② 《汪伪警卫部队部分作战详报》（1942—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592。

^③ 《军委会职员录》（1941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233。

^④ 《汪伪警卫第一师司令部及一、二、三团军官详细履历表》（1944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37。

^⑤ 《警卫第一师及所属各团人员任免文件履历表》（1944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3/840。

^⑥ 《汪伪警卫二、三师司令部及所属六、八、九团军官详细履历表》（1944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38。

^⑦ 《汪伪警卫二、三师司令部及所属六、八、九团军官详细履历表》（1944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38。

^⑧ 韩贤俊、吴树山：《伪警卫第三师弃暗投明经过》，江苏文史资料集粹编委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军事卷），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年版，第230页。

^⑨ 周佛海：《和平运动之前瞻与回顾》，《政治月刊》第2卷第2期，1941年8月，第15页。

^⑩ 苏时文：《汪伪的军事组织和伪军》，《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44页。

共建国”的青年可参加考试。^① 1941年9月16日,汪伪中央军校正式开学,第1期总共招收学生1000余人,“分编为3个大队,第1大队辖4个步兵团;第2大队辖骑兵、炮兵、辎重兵3个队;第3大队为工兵、交通通信兵。所学课程有战术、地形、筑城等;教材有黄埔的老课本,也有从日文翻译来的新课本。武器器材则多为日本明治年间的产品,以炮兵为例,用的是日式四一山炮、三八野炮”。^② 该校学制3年,1943年第1期学生毕业。汪伪政权许多要人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伪中央军校受训,如汪精卫及任援道等人的儿子都从第1期毕业。此后,汪伪中央军校分别于1943年招收了第2期,1944年招收了第3期学生共1600余人,第1期毕业生构成汪伪警卫军下级军官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第1期学生被广泛灌输汪伪所谓“和平反共建国”理论。有人认为“我们是负有和平反共建国使命的新军人”^③,有人认为“友邦既然站在战争的第一线,我们就有安定后方的责任。和友邦日本同甘共苦,来共同解放东亚,共同保卫东亚”。^④ 这种理论成为他们投身伪军的思想基础,同时他们也清楚所谓“建军”只是为了填补“友军”后方兵力不足而已。

2. 警卫军的编成

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2月15日召开的第二次伪全国军事会议对军事准备做了讨论。^⑤ 伪参谋总长萧叔萱认为“最近警卫师及独立第十四旅,并编为警卫第二师,业经编组完成,原有之师长及旅长,均能深意过去军队拥有私兵观念之错误,故十分愿意遂行,深堪嘉许”。“本总参谋长在就任之始,适值参战宣布之时,于访问友军高级长官之际,均表示希望我国训练国军以确保后方治安。盖我军若能确实做到后方治安之确保,与警备区域之扩大,则有友军可转用其兵力于前线,而我方亦可因此而扩大和平区域,以促渝方之觉悟,使全国人民更加一层之认识。故今后关于国军整备事宜,以渐进的合理的逐次进行,以增强国军实力,俾待于地方防卫及作战上,能与友军作同盟一体之活动,以达成确保治安之任务”。^⑥

如上文提及的,周佛海1941年下半年认为扩编嫡系部队应以警卫师为基础,以军官学校毕业生为核心,编成教导师。汪伪军事委员会于1942年即已制定《警卫军整备要领》,作为扩编嫡系部队的预案,该要领计划汪伪警卫军以伪卫士团、警卫师及伪独立第十四旅等部队为基干,于1944年底整备完成3个师之警卫军,总兵力为18000人至19000人左右。由于各部队员装备情况不一,整备要领中规定除补充团外,其他各单位应等待两个警卫师编成后再找时机编组。编组过程与之前收编军队的方法不同,首先强调军事、政治训练到位;其后要求能够通过汪伪相关部门考核;最后希望新建的警卫第一及第三师能够成为示范部队(即教导师),成为其政权“建军”的母体与样板。^⑦

首先开始编组的是警卫军第二师,初定以警卫师为基干与伪独立第十四旅合编。原计划1943年1月底前编练结束并接受检阅,此后从2月到6月进行5个月训练,进行第二次检阅,完成编组。

^① 考试内容有:国文、党义、外文、理化、数学、史地、口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始招生检同布告清单》(1941年7月—1944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6333。

^② 曹玄庆:《汪精卫“建军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第182页。

^③ 胡维国:《建国必先建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周年纪念专刊》,1942年9月16日,第53页。

^④ 陈绍贤:《友军战果之回顾》,《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周年纪念专刊》,1942年9月16日,第60—61页。

^⑤ 《第二次全国军事会议案》(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22。

^⑥ 《第二次军事会议(特辑)》,《政治月刊》第5卷第3期,1943年3月,第39—40页。

^⑦ 《军委会呈送国民政府直辖军队整备要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请备案》(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658。

改编过程中原警卫师与伪独立第十四旅^①先退出现役,各下属部队番号改为总队进行训练,训练完成之后重新赋予正规番号。^② 使用伪独立第十四旅军官替换原警卫师的军官。不过,实际上1943年1月即提前完成了编组工作。

警卫军第一师以汪伪国民政府陈皋为团长的伪卫士团^③为基干编为第一团,以广东伪政权提供的模范营补充其余两团,担任南京警卫工作。^④ 其编组分三期,第一期时间为1942年12月,由广东方面提供500人补充伪卫士团;第二期时间为1943年12月前,分三次由警卫军补充团提供1500人编组第2团;第三期时间为1944年9月前,由警卫军补充团分两次提供2000人编组第三团及师直属部队。

警卫军第三师原计划以伪编练总监公署教导团为主,于1943年年底前编成。实际改编过程中,警卫军补充团先行训练开封绥靖公署特务团,其后兵员补充则以国军战俘为主,在补充团训练完成后编入警卫军第三师各团,第三师于1943年12月21日提前编成。

警卫军第一及第三师的编组由伪陆军教导总队筹备处负责,按汪伪政权的设想是将其建设为“培育建立新军各级干部”的具有模范作用的教导师。^⑤ 伪陆军教导总队筹备处下辖军士教导团、军官大队、参谋补习班和见习军官研究班,培养扩军所需的军官与士官。军士教导团下辖3个营和1个补充连共计有军士1638人,作为两个师及炮兵战车营班长一级士官补充。军官大队下辖2个队6个区队,共计有学员144人,满足2个师及炮兵战车营所需要的军官编制的缺额。^⑥ 参谋补习班有学员24人,见习军官研究班培训汪伪中央军校毕业的第1期学员。^⑦ 伪陆军教导总队筹备处培养的军官与军士,是警卫军第一、第三两师扩军所需的干部基础。汪伪政权欲推广这种“建军”模式,但由于日本很快投降,这种模式没有了推广的机会。

表4 警卫军第一师兵器补充计划表

武器类型	步(骑)枪(支)	轻机枪(挺)	重机枪(挺)	掷弹筒(个)	手枪(支)	曲射炮(门)	迫击炮(门)	刺刀(把)
定数 (现有数)	1845 (910)	190 (17)	36 (12)	168	189 (595)	12	4	4170
第一次补充	935	83	24	100		12	4	

资料来源:《军事委员会为警卫军特务官及所属营连警卫军补充团机关请核查编制表及其它有关事宜》(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901。

^① 《军委会呈送国民政府直辖军队整备要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请备案》(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658。

^② 具体而言,原伪独立十四旅部队编入警卫师,警卫师各团改为总队,如第一团改为第一总队。训练完成后,赋予正式番号警卫军第二师,第一总队改称警卫军第二师第四团。《汪伪军事委员会会厅军四字第1051号训令》(1942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758。

^③ 卫士团官兵总计1120人,装备步骑枪910支,手枪574支,轻机枪17挺,重机枪12挺。《军委会呈送国民政府直辖军队整备要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请备案》(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658。

^④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第32页。

^⑤ 《会厅军四字第2600号训令》(1943年5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922;《军委会咨成立陆军教导总队筹备处》(1943年6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6391。

^⑥ 其余军官来自军士教导团军官339人,参谋补习班12人及汪伪军校第一期学员。

^⑦ 《会军四字第117号训令》(1944年1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802。

表 5 警卫军第二师兵器补充计划表

武器类型	步(骑)枪(支)	轻机枪(挺)	重机枪(挺)	掷弹筒(个)	手枪(支)	曲射炮(门)	迫击炮(门)	刺刀(把)
定数 (现有数)	1845 (4713)	190 (79)	36 (64)	168 (40)	189 (301)	12 (8)	4	4170
第一次补充		21		60		4	4	

资料来源:《军事委员会为警卫军特务官及所属营连警卫军补充团机关请核查编制表及其它有关事宜》(1942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901。

警卫军 3 个师中,第二师成立最早,武器充足且有富余。第一师改编自伪卫士团,故手枪数量很多。而第三师为新成立部队,所以没有武器,加之汪伪政权对其有戒备心理,补充的武器也不如第一及第二师。

表 6 警卫军第三师兵器补充计划表

武器类型	步(骑)枪(支)	轻机枪(挺)	重机枪(挺)	掷弹筒(个)	手枪(支)	曲射炮(门)	迫击炮(门)	刺刀(把)
定数 (现有数)	1845	190	36	166	189	4	4	4170
第一次补充	由第二师剩余补充	100	由第二师剩余补充	100	由第一师剩余补充	4	4	

资料来源:《军事委员会为警卫军特务官及所属营连警卫军补充团机关请核查编制表及其它有关事宜》(1942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901。

警卫军装备有了一定改善,主要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不得不更多依靠汪伪政权,使其能够“确实做到后方治安之确保,与警备区域之扩大”,并与日军共同作战。^①

3. 警卫军的编制

警卫军下辖军司令部、补充团、特务连、工兵营、搜索营、炮兵营、战车营、辎重兵营、通信队、军乐队、卫生队以及 3 个师。军司令部编制有上将军长以下官兵总计 174 人。装备有步枪 18 支,手枪 41 支,马 23 匹。

补充团下辖 3 个营,营下辖 3 个连。补充团团部官兵总计 98 人,营部官兵总计 42 人,连部官兵总计 31 人,基干编制人数为 503 人。补充时每连训练士兵 120 人,总计全团训练 1080 人,整编时补充团总计官兵 1583 人。

特务连下辖 3 个排,每排下辖 3 个班,官兵总计 150 人。装备有手枪 5 支,步枪 86 支,轻机枪 6 挺,掷弹筒 6 个。

工兵营下辖 2 个连,营部官兵总计 61 人,装备有手枪 11 支,步枪 9 支。每个工兵连官兵总计 184 人,装备有手枪 6 支,步枪 130 支,轻机枪 4 挺。

搜索营下辖 1 个直属搜索骑兵连,连辖 4 个骑兵排,每排下辖 4 个班,营部总计官兵 109 人。装备有手枪 25 支,马枪 30 支,轻装甲车 5 辆。骑兵搜索连官兵总计 185 人,装备有马枪 100 支,手

^① 《第二次军事会议(特辑)》,《政治月刊》第 5 卷第 3 期,1943 年 3 月,第 40—41 页。

枪 6 支，轻机枪 4 挺，马 186 匹。^①

战车营编制有 2 个连，1 个通信排和 1 个修理班。营部官兵总计 38 人，装备有手枪 5 支，骑枪 13 支。第 1 连为载重汽车连，下辖 2 个排，官兵总计 56 人，装备有步枪 24 支，骑枪 9 支，载重战车 15 辆。第 2 连为汽车连，编制与第 1 连相同。通信排官兵总计 50 人，装备有手枪 1 支，步枪 23 支。修理班官兵总计 32 人，装备有手枪 1 支，步枪 2 支。

炮兵营下辖 1 个山炮连和 2 个迫击炮连，营部官兵总计 109 人，装备有手枪 10 支，步枪 27 支。山炮连官兵总计 206 人，装备有手枪 5 支，步枪 50 支，山炮 4 门。2 个迫击炮连每连官兵 87 人，装备有手枪 5 支，步枪 40 支，迫击炮 4 门。^②

辎重兵营下辖 1 个大车辎重连和 1 个汽车辎重连。营部官兵总计 62 人，装备有手枪 11 支，步枪 5 支。大车辎重连官兵总计 206 人，装备有手枪 5 支，步枪 154 支。汽车辎重连官兵总计 126 人，装备有手枪 16 支，步枪 160 支。

通信队官兵总计 208 人，装备有手枪 7 支，步枪 70 支。警卫军军乐队官兵总计 40 人。警卫军卫生队官兵总计 139 人，装备有手枪 10 支，步枪 20 支。

警卫军下辖 3 个警卫师，其编制完全相同，均为师直辖特务连、工兵连、迫击炮连及通信队。每师下辖 3 个团，每团下辖 1 个步兵炮连，1 个通信排及 3 个步兵营，每营下辖 3 个步兵连和 1 个机枪连。

师司令部官兵总计 103 人，装备有手枪 20 支，步枪 12 支。师属特务连、工兵连、迫击炮连编制与军属同样部队编制相同，通信队官兵总计 76 人，装备有手枪 5 支，步枪 20 支。

团部官兵总计 100 人，装备有手枪 20 支，步枪 15 支，轻机枪 1 挺。团步兵炮连官兵总计 95 人，装备有手枪 5 支，步枪 30 支，步兵炮 4 门。团通信排官兵总计 42 人，装备有手枪 1 支，步枪 15 支。

营部官兵总计 41 人，装备有手枪 7 支，步枪 12 支，轻机枪 1 挺。步兵连官兵总计 93 人，装备有手枪 4 支，步枪 47 支，轻机枪 6 挺。机枪连官兵总计 96 人，装备有手枪 5 支，重机枪 4 挺。

总计警卫军每团官兵 1485 人，每师官兵 5026 人，官兵总共 18902 人。共装备马枪 130 支，步枪 6893 支，手枪 1278 支，刺刀 15715 把，轻机枪 646 挺，重机枪 120 挺，野炮 48 门，山炮 4 门，迫击炮 20 门，掷弹筒 564 个，汽车 10 辆，大汽车 58 辆，装甲车 5 辆，卡车 4 辆，自转车 260 辆及辎重车 91 辆。^③

4. 警卫军的兵员招募及补充

警卫军官兵补充分为军官补充和军士补充，军士补充由所辖各师挑选“优良”之上等兵送军补充团军士连训练完成；军官补充则尽量使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人员。除此以外，也可从汪伪将校训练团及汪伪中央军校毕业生中选拔补充。

官兵教育训练包括干部训练、军直辖部队特种干部训练、士兵教育。其干部教育由警卫军自身及伪将校训练团完成，军直辖部队特种干部教育由日本军队指导教育，而士兵教育则按照汪伪陆军

^① 《军委会呈送国民政府直辖军队整备要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请备案》(1942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658。

^② 《汪伪警卫军军属炮兵营战车营编制表》(1942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754。

^③ 《军委会呈送国民政府直辖军队整备要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请备案》(1942 年 10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658。

教育令进行并可由警卫军计划监督关于警卫事项的教育。^①

警卫军编成之初,缺额约有13000人左右,补充兵员要求“警卫第2师之缺额及第1、第3师之新编部队所需兵员,以征募良民子弟为主,不以来归部队或战俘补充”。^②招募计划中规定“建立新军招募处”,并将所缺员额分配到“和平区域”内各省完成。为保证兵员素质,所有招募成员均有年龄、身高、品行的要求。^③但随着汪伪政权加快警卫军扩编步伐,不得不使用国民政府军队的战俘,第三师官兵基本来自中条山战役被俘的国民政府军队的俘虏。

5. 警卫军的任务

借“参战”名义扩充的汪伪警卫军,其主要任务除担任汪精卫的个人护卫,负责南京的警备外,还要接替敌后日军防区,维持后方“治安”。其第一师主要担负南京城区的警备,第三师负责南京郊区警备。第二师一度驻扎安徽,配合日军接收军米^④,维持当地“治安”。所谓维持“治安”,意味着其主要作战对象必然指向敌后活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第二师师长秦汉青曾与日本顾问指挥第五团与新四军作战^⑤;第五团第六连增援六合守军对抗新四军^⑥;第二师第六团在句容、湖熟一带与新四军作战。^⑦1944年8月,第二师第六团第二营第六连在湖熟赵家边战斗中阵亡11人,受伤5人,被俘18人,损失惨重;9月,第二师第六团第一营营部及下属第一连在王庄被新四军全歼。在敌后中共武装的局部反攻中,汪伪警卫军有较大损失。1944年12月22日下午2时,汪伪警卫第三师第九团第一营(缺第三连)以及步兵炮1个排官兵291人,被新四军来(安)六(合)支队包围在六合程桥附近的羊角山(也称“羊头山”),经过一番苦战,被新四军全歼,损失轻重机枪13挺,步枪105支,掷弹筒6个,步兵炮1门。这是汪伪警卫军在与新四军作战中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日本及汪伪军政要员都为之震惊。到了1945年2月19日,新四军在六合季家香店与汪伪警卫军第二师第五团第二营第六连作战,给其造成很大损失。4月22日夜12时,汪伪警卫军第三师第九团第三营1个排34人在六合小金山据点为新四军袭击,在20分钟的激战中,被打死排长1人,士兵4人被俘。^⑧

6. 警卫军的结局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时,国民政府军队大都在遥远的大后方,原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都处在新四军的包围之中。8月11日,国民政府颁布对伪军伪组织的指示,试图利用日军和伪军防守住新四军的进攻,以赢得时间将军队运送到南京及上海^⑨,并随即对伪军进行汰弱留强的整

^① 《军委会呈送国民政府直辖军队整备要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请备案》(1942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658。

^②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6),“汪伪政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96页。

^③ 《新军招募计划草案》(1943年7月9日)、《军委会关于收编及新建部队的规定》(1941—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764;《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6),“汪伪政权”,第903页。

^④ 《警二师司令部呈派遣官兵赴滁经过情形》(1944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公署档案,2031/9018。

^⑤ 《警卫第二师卫二字第2243号呈》(1943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595。

^⑥ 《会令字第118号训令》(1944年1月17日)、《前警卫师呈送结束后各项移交清册》(1941年7月—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004。

^⑦ 《警卫第二师卫二字第2913号呈》(1944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595。

^⑧ 《汪伪警卫部队部分作战详报》(1942—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592。

^⑨ 《对伪军处置各文件》(1945年8月11日)附件第6。转引自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5)》,第372—373页,注释3。

编。“对于有战力的各类型伪军的整编，采取名改实不改，不减少伪军人数的方式，以便达成扩军与反共”^①，大约 30 万伪军被淘汰，原因在于“他们通常战力不佳、武器缺乏又不好、军纪也欠佳”。^②

汪伪警卫军由于战斗力较强，属于国民政府计划收编的军队。国民政府欲利用其防守南京及上海。1945 年 8 月 14 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电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警卫第 1 师师长刘启雄为第 1 路指挥”。^③ 8 月 19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成立”，陈公博“建议蒋介石委任警卫第 2 师师长秦汉青、第 3 师师长鲍文沛为第 2、第 3 路指挥”。^④ 汪伪警卫军协助国民政府军队与新四军进行多次作战，“芜湖伪第 40 师与南京伪警卫第 2 师在 9 月 7 日至 11 日，协助国府第 171 师攻入中共的巢湖东南方向裕溪口等津浦铁路地区”^⑤，“南京刘启雄警卫师被廖耀湘任命为暂编师，并赋予刘以京畿东南地区剿匪指挥官名义，命令所部开驻苏南溧水，肃清该地区的共军”。^⑥ 8 月 17 日，上海“税警团熊剑东率 3 个中队，清扫沪郊西南地区”。^⑦

1945 年 9 月，国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师到达南京，汪伪警卫军被其全部收编，“邱维达的 51 师编并了伪警卫第 1 师和伪警卫旅（此时已无警卫旅番号——引者注），57 师和 58 师则分别编并了伪警卫第 2、第 3 师”。^⑧ 最终随着整编第七十四师（原第七十四军）在孟良崮战役被全歼而灰飞烟灭。

由于日本政府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作为傀儡政权武装的汪伪警卫军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最终逃脱不了被收编、被消灭的命运。

四、掌控与压制：日方与汪伪警卫部队

纵观汪伪警卫部队的建立与发展，其过程必须服从日本的政策：如果日方实行限制政策，就会收紧对汪伪军队的控制；当日方实行利用政策，则相应放松限制。警卫部队的建立与发展，随着日汪关系的变化而改变。

1. 政策变化：日方与警卫部队的建立与发展

1937 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方扶植伪政权以有效控制占领区。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是受到日本特务机关重点关注对象之一，1940 年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成立。日方执行对汪伪政权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军事方面亦是如此。

1938 年 1 月 30 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在《昭和 13 年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中对于所谓的“新兴政权”（即汉奸政权——引者注）规定：“新兴政权为其领域内治安及边防之需要，建设其

^①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5）》，第 390 页。

^②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5）》，第 392 页。

^③ 蔡德金、李慧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0 页。

^④ 蔡德金、李慧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 282 页。《陈公博以南京表面暂告平息尚有危机请予胡毓坤们致中等统率伪军维持治安并派员接管伪中央陆军学校之皓电》（1945 年 8 月 19 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 6 编，“傀儡组织”（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 年版，第 1552—1553 页。实际蒋介石批示为：此等汉奸无耻，何必再理。参见《周至柔陈布雷对陈公博呈蒋主席八月皓电之签办》（1945 年 8 月 21 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 6 编，“傀儡组织”（4），第 1554 页。

^⑤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5）》，第 375 页。

^⑥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5）》，第 375 页。

^⑦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凤凰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3 页。

^⑧ 刘措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6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65 页。

警察队及军队(当前每一省应以警察队两万名,军队两个师为标准)。”^①同年7月19日,日本在《中国政权内部指导大纲》中关于军事这样规定:“缔结防共军事同盟,在日军指导下逐次改编军队,如形势允许,将军队裁减到国防所需的最小限度。”^②1940年6月24日签订的《治安协定》规定:汪伪军警各机关必须在日军指挥下,协助日军负责维持行政区域内的治安肃清,日军大队长可指挥伪军团长及其以下官兵。^③这种限制的目的在于限制伪军实力,控制伪军发展以及干涉伪军指挥,避免威胁日方的利益。汪伪政权的“建军”是一项重要活动,但日方以限制为原则,对警卫旅建立亦设置重重障碍。警卫旅在安徽寿县征募700余人,由于日本驻军阻挠,无法编入警卫旅,旅长刘夷只能哀叹“环境如此,徒唤奈何!”^④

日方由于诱降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尝试失败,不得不全力支持汪伪政权。在汪伪政权控制区域内,中国的抗日武装活动频繁,打击日方的统治与掠夺,日本实行的“以战养战”政策无法实施。当时日方有人认为“加强国民政府以完成事变,对我国来说,很明显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说,现在正面对着必须将中枢机构改组为强有力的机构,以谋求用自力发展政治势力的局面”。强化汪伪政权的手段之一就是让汪精卫自己成立军校,培养“建军”的军事人才。^⑤因此,日方“不能不以加强扶植为基本方针。以前曾给新政府对重庆政府工作和收揽民心的任务,尔后,还应要它们负担协力我们处理事变和建设新国家的新任务”。^⑥日方认为,汪伪政权的成立极大刺激了中国军队的“归顺”。虽然“归顺”军队仍然以杂牌军和地方武装居多,但以此为契机,阎锡山、于学忠等开始与日方“暗送秋波”。^⑦为此,日方随之制定强化汪伪政权的政策,1941年开始的“清乡”运动是强化汪伪政权的具体措施,维持治安则是“清乡”运动的目的。在军事上,日本方面希望“随着地方安定,政府实力的加强,要划分区域,将治安政治逐步委托给国民政府,给予其基本根据地……所以,原则上根据需要,给以必要的援助”。^⑧这样,日方利用汪伪政权军队分担后方防务,解决日军兵力不足的难题,因此放松了对汪伪政权扩军的限制。汪伪政权亦以加强南京防卫为名,将警卫旅扩编为警卫师。但日方对汪伪政权此次扩军防备措施,规定“鉴于整建的目的,当前的编制,在正规军队,除特别规定者外,应以步兵为主。其装备,以步枪、手枪为主,并配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其他的武装团体,以徒步为主。其装备主要为步枪、手枪。均应避免大的合编”。^⑨日方既想扩大汪伪政权实力,协助确保其占领区治安,又不愿意汪伪政权实力壮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日方认为“国民政府参战是日华间打开局面的一大转机,因此,它将在本着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的同时,积极消灭重庆抗日的借口,真正使新生中国与我同心协力,为完成战争任务而努力”。并要“根据将来国民政府的充实和加强及其对日合作的具体实现等,考虑适时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6页;另参见閔東軍參謀部「新興支那建設方策大綱」(昭和13年1月20日)、白井勝美『現代史資料』9、みすず書房、1964年、236頁。

^② 堀场一雄著,王培岚等译:《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③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3—164页。

^④ 《警卫旅旅长张诚拟具征募新兵办法呈文》(1940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8602。

^⑤ 《关于国民政府的强化问题》(1941年8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13),“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33页。

^⑥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473页;省部關係課「新中央政府樹立を中心とする事変処理最高指導方針」(昭和14年10月30日)、白井勝美『現代史資料』9、578頁。

^⑦ 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部「帰順部隊帰順狀況」(昭和16年1月20日)、白井勝美『現代史資料』9、485—486頁。

^⑧ 余子道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121页。

^⑨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556页。

地对日华基本条约和各项附属规定，加以必要的修改”。^① 1943年，为了占领区“治安”，日方调整政策，进一步放松对汪伪政权扩充军队的限制。其步骤如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回忆那样，首先对已经培养出来的初级军官，灌输所谓“建军”理念，然后培养高级将领的所谓进取心，再次裁撤所谓“不良的军队”，第四是用日本武器装备，重新招募兵员以建立警卫军。^② 日本政府希望汪伪政权的军队能够壮大，并可以接替部分日军防务，代替日军执行部分确保占领区治安的任务。汪伪政权则借此机会控制其他伪军，发展警卫部队。警卫军从任援道所辖军队手中全面接替南京及周边地区防务就是其重要举措。随着警卫军的建立和扩充，汪伪警卫部队的任务不再单纯是伪政权的警卫力量及南京的警备力量，还担负了一定的作战任务。

2. 掌控军事：军事顾问部与警卫部队

无论日本方面对汪伪政权采取何种政策，掌控汪伪政权警卫部队这一企图没有改变，即使在汪伪政权“参战”之后亦不例外。这一时期，日本表面上放松了对汪伪警卫部队的控制，但实际控制丝毫没有放松。

日方始终掌控伪军的指挥权，在《日华基本关系条约》的秘密换文中，日方规定日本政府可以向汪伪政权派遣顾问，军事顾问部是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军事、政治控制的最高机关，“其职权在辅助设计中国一般国防军事之设施，及中日防共军事协力事项。辅助设计中日防共军事协力事项之顾问，得由最高军事机关派往防共军事上之必要地点服务。第三国之军事顾问不得预闻中日军事协力事项”。^③

罗君强回忆，“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人员大部分参加了军事顾问部，首席军事最高顾问就是影佐少将，以后继任的是松井太久郎中将、柴山兼四郎中将、矢崎勘什中将、浅海濑少将……军事顾问部对汪伪军各部队及各省市均派有军事顾问……军事顾问部不仅掌握汪伪军事计划、方案、法令、规章的拟定，还要注意到汪伪各部队一排一班的驻地。汪伪从日方搞了一笔军事贷款，即以此款购置汪伪军的武器。武器的分配，日方管得很严密，而且常常以废旧品充数”。^④ 日军军官还能指挥比自己级别高的伪军军官。^⑤ 虽然曾任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的影佐祯昭认为军事顾问的职责在于当伪军执行任务与日军发生摩擦时，由军事顾问居中调停。^⑥ 不过实际上，日方控制汪伪政权的军事力量，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向汪伪军队派遣军事顾问，并由顾问以建议方式提出指导要求。例如曾在军事顾问部担任过顾问的晴气庆胤回忆：影佐祯昭实际上不单纯是军事顾问，也是政治顾问，是给汪精卫出主意的人。甚至汪伪政权的“清乡”工作，也是军事顾问部提出的加强汪伪政权力量的一种政治建设方法。^⑦ 日方通过军事顾问部控制汪伪各部队的指挥、调动。

日本军事顾问部关注汪伪政权军队各项活动，对于汪伪政权嫡系部队更是如此。按照规定，日本军方人员可以参加汪伪军事委员会的全国军事会议。^⑧ 日本军事最高顾问松井太久郎甚至直接

^① 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第687页。

^② 影佐祯昭「汪政府の軍隊建設」（1943年12月）、白井勝美『現代史資料』13、みすず書房1966年、392頁。

^③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揖唐致伪山东省长唐露岩函》（1941年8月2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6），“汪伪政权”，第814页。

^④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第41页。

^⑤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63—164页。

^⑥ 影佐祯昭「汪政府の軍隊建設」（1943年12月）、白井勝美『現代史資料』13、392頁。

^⑦ 晴气庆胤著，朱阿根等译：《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⑧ 《全国军事会议案》（1941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21。

插手警卫军第二师的编成。^① 汪伪方面则很快做出回应，并按照日方要求办理，第二师师长的人选亦必须由日方同意方得任命。^② 不久，日本军事顾问部中森顾问对汪伪警卫第二师编成又提出了意见，要求第二师以负责的态度进行整编，以成为所谓新“国军”的基础。同时要求汪伪政权军事部门有效监督，以完成警卫军的扩编任务。^③ 无论是部队主官任命抑或是整编态度，日本军事顾问都深度介入，伪军方面不得不言听计从，其傀儡性可见一斑。

1943 年 1 月，汪伪政权“参战”后，尽管日本表面放松了对汪伪政权的控制，积极参与汪伪警卫军的扩编，但事实上的控制仍无处不在。日本军事顾问对汪伪警卫军整编时的管理部门、主官任免、应负责任都有相应意见，汪伪政权则按照日本顾问的要求进行回应。日本顾问似乎比汪伪政权内部某些人更关注警卫军的扩编，要求汪伪政权各部门全力支持扩编警卫军，使警卫军成为“国军之建设再建之基础”，日本方面需要汪伪军队协助作战，缓解压力，如警卫军“仍堕于从来一般之军队”，则无法协助日军。

3. 限制与压制：通济门事件

尽管日方对汪伪警卫部队的建设进行了一些扶植，但实际上仍怀有戒心，进行了种种限制。日军的中下级官兵出于对中国人惯有的蔑视，常常进行挑衅，双方冲突不断。有回忆称“1944 年 8 月，三师驻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的士兵与日本士兵发生冲突，打死了两名日本士兵，其连长被拘留，陈孝强的师长职务也被免除”。^④ 这一事件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引发警卫军第三师官兵对日军的怨恨心理，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情绪。坊间有一些关于此事件的传言，许多并不准确。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据汪伪陆军部对涉案人员的审判书记录：

1944 年 5 月 28 日夜，警卫军第三师特务连排长夏建华等人饭后雇黄包车回通济门营房时，与通济门日军卫兵长高草木英夫发生冲突，夏建华被打耳光，之后还被日军扣留关押。他回到驻地后十分不满，特务连排长孙宝光、汪洵、陈同来及连长郭健衡得知消息后，率领士兵 8 人带枪理论。日军卫兵见势不妙，准备反击。随行的陈同来用战刀击灭电灯，夏建华向卫兵室里面开枪，胡士正将日本卫兵步枪夺下，也向卫兵室开了一枪。冲突之中，日本卫兵长高草木英夫中弹负伤，在场的另一个日本卫兵森田稻吉被子弹碎片击中负伤。夏建华等人认为出了一口气，随即集合回到营房休息。

第二天，在日军威胁下，第三师将夏建华押送至伪宪兵司令部关押，伪陆军部很快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军法会审。日方对此事非常重视，认为这是汪伪军队反日情绪的一个表现，逼迫汪伪政权必须对于当事人进行严惩。迫于日方的压力，军事法庭只能以暴行胁迫及杀人未遂罪起诉夏建华等 13 名卷入冲突的官兵。军事法庭最终判处当事人夏建华死刑，开枪的排长陈同来无期徒刑，连长郭健衡被指责督率部下不严，参与违法活动，判处有期徒刑 7 年，士兵胡士正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其余相关人员被判处 6 个月到 3 年的有期徒刑。^⑤

事情经过并不复杂，涉事的警卫军第三师军官醉酒殴打黄包车夫在前，日军卫兵在干涉过程中对他们进行掌掴，伪军官兵认为受到侮辱，在随后的报复时双方发生冲突与枪击，日军有两人受伤。汪伪政权

^① 《军事委员会为警卫军特务官及所属营连警卫军补充团机关请核查编制表及其它有关事宜》(1942—1943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7901。

^② 《汪伪编练总监公署总监黄自强致日本军事顾问部总顾问松井太久郎公函》(1942 年 12 月 8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758。

^③ 《日本军事顾问部之意见书》(1942 年 12 月 14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758。

^④ 韩贤俊、吴树山：《伪警卫第三师弃暗投明经过》，《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军事卷)，第 223 页。

^⑤ 《陆军部审理警卫第三师特务连排长夏建华等十三名伙党暴行胁迫及杀人未遂判决案》(1944 年 7 月 7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357。

在日军的压力之下判处相关人员重刑，并撤销陈孝强师长之职。其内部许多人认为日方小题大做，过于霸道。但握有实权的周佛海在日记中称：“我警卫3师枪伤日哨兵两人，事态虽不至扩大，然于建军前途必有影响也。军校毕业生既无作战及带兵之经验，而又娇气横生，较之黄埔生，只有短而无其长，殊可虑也。”^①作为汪伪政权实权人物，事情发生后周佛海不但没有考虑下属青年军官安危，反而担心事态扩大是否影响双方关系。伪军尤其是警卫军第三师相当部分官兵愤恨日方的处理，这成为第三师后来起义的导火索，中共地下人员能够做通警卫军第三师官兵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也肇因于此。^②

尽管日方同意汪伪政权扩编其警卫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方放弃对伪军的掌控，军队人员扩张、装备加强只是表象，日方表面的松绑是为了自身在华利益的考虑。一旦伪军的民族情绪露头，日方必然会进行镇压。因此，所谓的“参战”只是汪伪政权地位虚幻的上升，日方采用的是“明松暗紧”的策略，目的就是减少中国战场的兵力，武装伪军去攻击自己的同胞。汪伪警卫军的发展并不能证明日本对华政策有实质性变化，伪军的傀儡性质也不会随之改变，日本军事顾问部对警卫部队的干涉和“通济门事件”正是日方对伪军掌控与压制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余论

警卫部队是汪伪政权实现“建军”目的的支柱，尽管汪精卫试图通过建立军校，培植亲信武装的方法来进行“建军”，以期巩固政权统治，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决定了其一切必须要服从于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占领军的政策。有西方研究者套用维希法国与纳粹德国的模式，认为汪精卫伪政权与日方是“合作”关系，而不是叛国的傀儡。^③以一种看似中立立场的道德判断，似乎可以去除汪伪政权的污点。也有研究者认为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性，部分的源于一个军事化时代文人的处境”。^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汪精卫并非没有挑战军事化时代，建立警卫部队就是他“建军”的尝试。这一尝试为何失败？与他文人的处境关系不大，而在于他在战争中选择与敌对国“合作”。一方面，汪精卫欲彰显其政权的“独立性”，而不是所谓的傀儡政权。因此汪声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正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人。在军事化时代，他要完成“建军”来显示自己政权的实力。另一方面，在“建军”的过程中，其军事力量不断受到日方的掌控与压制。面对实际上的傀儡地位，还要找到合适的说辞以维护自身形象。就这个两难选择而言，汪精卫及其同僚想要维持平衡，难度未免过大。

就“建军”而言，日方完全根据自身利益掌控汪伪政权武装的程度，汪伪政权只能在日方划定的范围内“戴着镣铐起舞”。陈公博认为：日本“对于军队的调动故意拖延，使南京无集中军力的机会”，“警卫一、二、三3个师，除了第一师刘启雄留守南京以外，日本总以分防为词，不让我们集中”。^⑤总体而言，伪政权军事方面不能自主是显而易见的。

“和平反共建国”是汪伪政权的基本理论，为了从思想上控制官兵，汪伪警卫部队自上而下建立了一整套政训系统，对此理论进行灌输。“伪军委会政训司，一直由陈公博的亲信周正己担任司长。汪赴日后，陈公博支持周在南京四条巷李公祠开办了政治训练班，招收高中学生，进行政治训

^① 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下编，1944年5月29日，第884—885页。

^② 《生死存亡无足论，待看红日照人间——怀念徐楚光烈士》，华东情报史编纂委员会编：《华东情报史专题选辑》，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江苏省国家安全厅、华东情报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4年编印，第524—525页。

^③ 参见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等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④ 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

^⑤ 陈公博：《自白书》（1945年11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第18—19页。

练,灌输‘和平建国’的毒素。每六个月一期,毕业后由伪军委会分派到各伪军师,担任连营政训员工作,企图掌握基层部队。第一期毕业生一百三十余人,完全如愿以偿地安排到 3 个警卫师的基层,担任了政训工作”。^① 该训练班训练目的在于“就国家国际之现时情况阐明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要求“绝对铲除共产主义的思想”,不断与学员进行个别谈话,询问学员对于政训工作以及“和平反共建国”理论的认识,以期“纠正学员之思想,诱导其行动”。^② 伪警卫军军部以及下辖 3 个师部都有政训室,师下辖各团则都有政训处,甚至每个连都有政训员 1 人。

然而这样的政治控制依然无法巩固军队,1940 年 12 月,汪伪警卫旅的花名册上记载士兵逃亡 33 人。^③ 不但普通士兵逃亡严重,军校学员也有逃亡现象。1941 年 9 月 17 日,汪伪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分配到警卫师特务团见习的学生谢振海就借口回天津探亲逃亡。^④ 警卫师甚至发生了哗变事件,参与哗变官兵共计 300 余人,一批军官受到各种处分。师长李讴一呈文中言及:“查此次所属第 1 团第 3 营 8 连及 7、9 两连各一部分官兵哗变,所有第 3 营少校营长赵云华、第 8 连上尉连长汪昭臣,平时对于所属管束无法,训导失当,临事畏缩,不尽弹压之责。第 7 连上尉连长鲍国卿当其部属有哗变行动时,即赴镇弹压,故仅有一部参与。第 1 团上校团长李友竹知有哗变消息,未能妥善处理,均应分别处分。第 9 连哗变之一部系奉派在营部守卫之士兵,而当哗变前该连长崔玉珂适赴横溪镇防地巡视,未及处理,情有可原。”^⑤ 实际上,逃亡与哗变现象在汪伪各军队中都不鲜见。此外,汪伪警卫部队虽然表面上注重军风军纪,但实际上扰民事件不断。例如,警卫师第一团团长罗卫就因军队驻扎淳化时勒索当地官绅居民钱财 15000 余元而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⑥ 在着力宣传汪精卫“和平反共建国”理论下,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所谓的宣传不可能抵消伪政权的傀儡性质。所以,其官兵要么用逃亡来摆脱,要么追求眼前利益,因此,出现上述情形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叶铭,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后]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张恒:《伪政权后期军事情况一瞥》,《江苏文史资料》第 29 辑,第 103 页。

② 《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政训班工作报告》(1942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军事委员会档案,2038/223。

③ 《警卫旅步兵一团兵夫入伍花名清册》(1940 年 12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844;《警卫旅步兵司令部及第二团官佐兵夫役入伍花名清册》(1940 年 8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845。该数据为综合两份资料所得。

④ 《军委会通缉第一方面军、陆军军官学校等单位潜逃人员案》(1940 年 8 月—1941 年 11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行政院档案,2003/816。

⑤ 《警卫师师长李讴一呈请处分第一团第三营哗变各级官长案》(1942 年 6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经理总监署档案,2031/6843。

⑥ 《陆军部审理前警卫师第一团团长罗卫辱职判決案》(1943 年 9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国民政府档案,2002/363。



Armed Puppet: A Glimpse into the Guard Force of Wang Jingwei Puppet Regime

..... Ye Ming (63)

Wang Jingwei puppet regime's own force was its guard for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ce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from the Guard Brigade, the Guard Division to the Guard Army, with good equipments among all puppet armies. From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extinction of the guard force of Wang Jingwei puppet regime, it can be seen that Wang Jingwei puppet regime tried to build up an armed force under its control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gime's existence. This was the instrumental aspect of its armed forces. However, every process of the force's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was subject to Japan's overall China policy, especially were influenced by Japan's policy towards Wang Jingwei puppet regime. Therefore, the armed forces of Wang Jingwei puppet regime could only survive under Japan's control, which inevitably had a nature of puppet army. During modern times, military forces were alway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politics. However,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developing and disappearing of the guard force of Wang Jingwei puppet regime shows that even if they were armed, they could not get rid of the puppet characteristics.

Taihei Association, Military Trade and Japanese Army's China Policy

..... Guo Xunchun (83)

Taihei Association was a common term i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organization were driven by the Japanese Army's China policy. In 1908,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mpetitions between Japan and Germany in China's arms market, the establishment of Taihei Company was promoted by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Japanese Army's separatist policy towards China, Taihei Association acted as a tool for Japan's national policies toward China. In 1917 and 1918,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Japanese Army's arms alliance, military alliance with China and its policy of assisting Duan Qirui, Taihei Association played a role of linking Terauchi cabinet's policies toward China. By examining the activities of Taihei Association in Japan's arms trade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e can discover the main clues of the Japanese Army's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period.

The Studies and Judgment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n the Japanese Military Strategy of Invading China before the Outbreak of China's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Yuan Chengyi (97)

From Assassination of Hu Enpu and Bai Yuhuan to He Yingqin-Umezu Agreement: Chiang Kai-shek's Disposal of North China Incident

..... Zhang Hao, Piao Hongyan (107)

“Mind Management” and the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eeking the Help of Kong Decheng and its Dilemma

..... Li Junling (125)

The Turn of the Writing about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Centered on 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by Peter Harmsen

..... Yang Xiangkun (141)

“Wool is Gunpowder:” A New Vision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Aggression

..... Qi Jianmin (146)

Restarting of the Studies on Shando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A Summary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handong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 Zhang Xueqiang (148)

A Summary of The Fifth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o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Du Wei (154)